

李白研究論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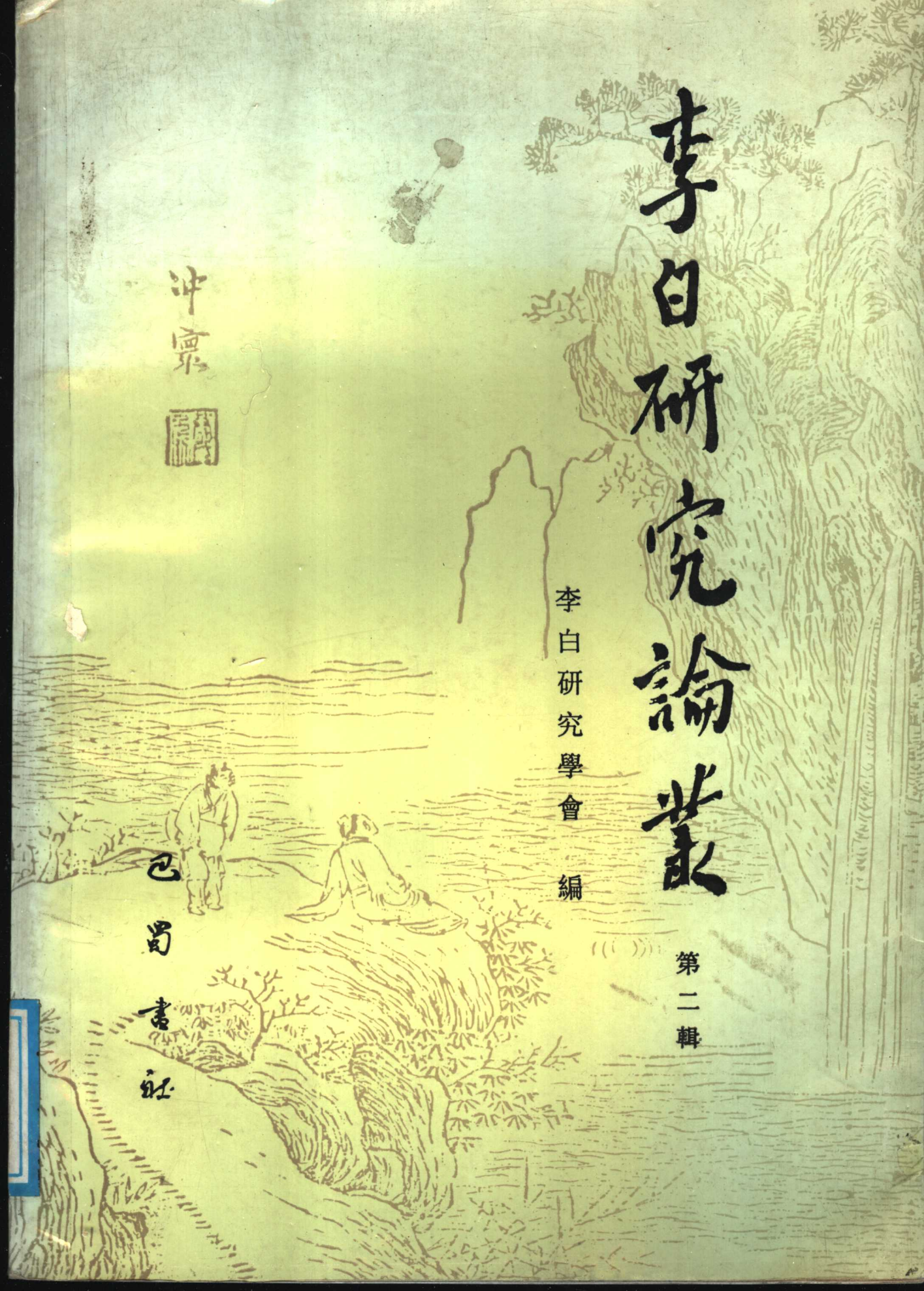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輯

李白研究學會 編

冲泉



巴蜀書社



李白研究學會 編

李白研究論叢

第二輯

巴蜀書社 · 一九九〇年 · 成都

張大千書《李白行吟圖》（藏江油李白紀念館）



李白研究論叢第二輯目錄

併莊屈以爲心·····	王運熙 (1)
略論莊屈對李白歌行詩的影響·····	陶道恕 (7)
以超越的眼光俯察宇宙與人生·····	葛景春 (17)
論李白的仙道思想·····	曹方林 (25)
李白東海之行和他對道教態度的變化·····	康懷遠 (29)
道教與李白詩歌的想像藝術·····	胡 遂 (35)
略論道教對李白詩歌的影響·····	呂華明 (47)
李白與佛教思想·····	章繼光 (51)
李白文學思想辨析·····	陳昌渠 (59)
李白的人生態度·····	楊勝寬 (69)
試論李白的憂患意識·····	孫功發 (75)
略論李白詩以意驅象的特點及其文化心理成因·····	盧燕平 (81)
李白《古風五十九首》芻議·····	郁賢皓 (87)
論李白樂府詩的歷史意義·····	喬象鍾 (99)
李白與歷史人物·····	裴 斐 (113)
敦煌寫本殘卷中李白詩歌校記·····	朱宗堯 朱子由 張應松 (127)
李白蜀中詩試探·····	梁吉充 (135)
李白少作藝術管窺·····	丁稚鴻 (143)
李白出峽及其詩作辨識·····	楊栩生 (147)
李白待詔翰林時期作品探索·····	王定璋 (153)
論《門有車馬客行》的寫作年代·····	王定超 (159)

《蜀道難》意象新探·····	張立偉 (161)
《鄴中贈王大勸入高鳳石門山幽居》考索·····	安 旗 (165)
《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》應是《陪侍御叔華登樓歌》·····	詹 鎂 (171)
《永王東巡歌》與永王璘事件辨析·····	王自成 (181)
李白岳陽行及其詩·····	王仲鏞 (185)
論李白《與夏十二登岳陽樓》詩及有關問題·····	熊培庚 (191)
從李白晚年在湘詩看詩人創作個性的變遷·····	王昌猷 (195)
李白樂府革新成就一例·····	鄧元煊 (203)
《僧伽歌》非偽作辨·····	劉友竹 (207)
《江南逢李龜年》為李白作·····	王輝斌 (211)
人生不朽是文章·····	牛寶彤 (219)
讀李白賦札記五則·····	譚優學 (223)
《李白歸蜀考》補正·····	鄭 文 (229)
李白四入東魯始末·····	丁 冲 (237)
李白寓家東魯時間存疑·····	張 昕 (243)
李白與吳筠究竟有無交往·····	李生龍 (251)
李白被逐探微·····	房日晰 (261)
李白到過零陵辨·····	何書置 (265)
關於李白出生地與逝世處的探討·····	馬依羣 (269)
李白詩文地理考釋·····	張書誠 李清淵 官衍興 張才良 (277)
李杜優劣論和李杜詩歌的歷史命運·····	馬積高 (289)
論“一李九杜”與“一杜九李”的審美差異·····	羊春秋 (301)
論歷代詩話之李杜比較研究·····	蔡鎮楚 (309)
李白書法探蹟·····	李 戎 (319)
“采石江邊李白墳”辨疑·····	朱金城 (323)
李白舊宅記辯誣·····	吳丹雨 (327)
譜李白詩三首·····	蔡肇祺 (331)
後記·····	(337)

併莊屈以爲心

——李白詩歌思想內容的一大特色

王 運 熙

清代龔自珍在評論李白詩歌時曾說：“莊屈實二，不可以併；併之以爲心，自白始。”（《最錄李白集》）這句話指出了李白詩歌思想內容方面一個很鮮明的特色，對我們很有啓發意義。

屈原和莊周都生活在戰國中期，差不多是同時代人（屈原比莊周約小二十歲）。兩人的作品雖然一爲韻文，一爲散文，但都具有感情洋溢、想象豐富、語言自由奔放的浪漫主義藝術特色。屈賦大量採用神話傳說，《莊子》大量運用寓言重言，方法也頗爲接近。可以說，兩人分別在詩歌和散文領域表現了南方文化瑰瑋奇麗的特色。但是，在思想內容特別是生活理想和政治態度方面，兩人作品則表現出極大的分歧。屈原有很大的政治抱負，迫切希望輔佐楚王實現“美政”，促使楚國富強，雖經流放，毫不變心，終於投身汨羅，以身殉國。熱愛祖國，積極要求參加政治活動，爲國效勞，像一根紅綫貫穿着他的一生。而莊周則把做卿相、輔帝王看作是一種災難，避之唯恐不遠。他企求過雖然清貧但却逍遙自在的生活。他把遺世獨立、物我兩忘的“至人”、“真人”等作爲自己追求的理想，要求超脫世俗而進入一種神秘的境界。在這方面，莊屈兩人，猶如胡馬之與越鳥，各安其所，不可以合併。也正是在這方面，李白却是對莊屈思想兼採並容，並把它們巧妙地結合起來，在詩歌的思想內容方面開闢出一個新境界。

李白與屈原在精神上的共同處是很多的，其基本共同點是熱愛祖國，憎恨黑暗腐朽勢力，積極要求參與政治活動，貢獻才能。像屈原一樣，李白也有很大的政治抱負，他希望做帝王的輔弼大臣，展其才能，“使寰區大定，海縣清一”（《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》），爲國家的統一和安定作出貢獻。天寶元年，唐玄宗下詔徵李白入長安，他心頭極端欣喜，“仰天大笑出門去”（《南陵別兒童入京》），滿以爲實現理想的機會到來了。可是他在朝廷不久，即遭受權佞的譏毀，被玄宗賜金還山，遭遇到類似屈原的放

逐命運。在之後十多年間，李白漫游各地，縱酒學道，但始終關心國事，他寫下的不少詩篇，在思想內容和表現手法上都可以看出受到屈原的深刻影響。例如他描寫自己上游天庭、吃閉門羹來比喻政治上的挫折和理想的破滅：

我欲攀龍見明主，雷公砰訇震天鼓，帝旁投壺多玉女。三時大笑開電光，倏燦晦冥起風雨。閭闔九門不可通，以額叩關閭者怒。（《梁甫吟》）

使我們想起《離騷》中的句子：“吾令帝閭開關兮，倚閭闔而望予。”他描寫自己遭受權佞的嫉妒和讒毀：

由來紫宮女，共妒青蛾眉。（《古風》其四九）
君王雖愛蛾眉好，無奈宮中妒殺人。（《玉壺吟》）

也使我們想起《離騷》：“衆女嫉余之蛾眉兮，謠諑謂余以善淫。”又如他描寫當時朝廷中政治腐敗、奸臣當道的情景道：

梧桐巢燕雀，枳棘棲鴛鴦。（《古風》其三九）
鷄聚族以爭食，鳳孤飛而無鄰。蜺蜺嘲龍，魚目混珍。嫫母衣錦，西施負薪。（《鳴皋歌送岑徵君》）

使我們想起《九章·涉江》末尾的亂辭：“鸞鳥鳳凰，日以遠兮。燕雀烏鵲，巢堂壇兮。露申辛夷，死林薄兮。腥臊並御，芳不得薄兮。陰陽易位，時不當兮。”在《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沈之秦》詩中，李白描寫自己雖遭放逐，但一心繫念朝廷，他甚至用屈原自比：

遙望長安日，不見長安人。長安宮闕九天上，此地曾經爲近臣。一朝復一朝，髮白心不改。屈平憔悴滯江潭，亭伯流離放遼海。

此時此際，李白和屈原的遭遇和心情，的確是何其相似啊！

安史之亂爆發後，李白放棄了在廬山一帶的隱居生活，參與永王李璘的幕府工作，希圖對蕩平叛亂、安定唐朝有所貢獻，不幸以此獲罪。流放回來後，他已進入垂暮之年，但仍然非常關心國事，渴望叛亂早日平息：

桀犬尚吠堯，匈奴笑千秋。中夜四五嘆，常爲大國憂。……安得羿善射，一箭落旄頭！（《贈江夏韋太守良宰》）

肅宗上元二年（761），唐朝太尉李光弼率大軍出鎮臨淮，追擊史朝義。李白還準備從軍，半路因病折回，有詩記其事。次年，他就因病逝世。李白熱愛祖國、要求爲國家貢獻才能的心情，是多麼深沉和執着，以至於至死不渝啊！正是在這點上，李白可說是繼承了屈原愛國精神的優良傳統。

李白對屈原的作品給予極高的評價：“屈平詞賦懸日月，楚王臺榭空山丘。”（《江上吟》）屈原的辭賦，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藝術性，的確可與日月爭光，永垂不朽。李白的詩歌，洋溢着愛國的激情，繼承並發展了屈賦的極積浪漫主義傳統，也可與日月爭光，永垂不朽。

李白作品的思想內容，接受了莊周的許多影響。莊周是一個唯心主義哲學家，他的思想中包含着許多消極落後的成分。李白詩歌中有時表現出來的人生若夢的虛無思想，即是受到莊周的影響，他的神仙邀游太空觀念，也與《莊子》有關。這些都是消極的、應該批判的方面。但同時李白也接受了莊周鄙夷爵祿富貴、藐視權豪勢要的精神態度，構成了他作品積極內容的一個重要方面。

莊周對爵祿富貴是很鄙視的。《史記·老子韓非列傳》記載：楚威王聽說莊周賢能，派人迎他做卿相，莊子不肯接受，他認爲做官猶如被屠宰了供祭祀用的犧牛，是一種災難，自己寧願象遊戲於小河中的動物那麼逍遙自在，不願受爵祿的羈絆。《莊子·秋水》中也有類似的記載。《秋水》篇更有一個故事，說莊周到梁國去見朋友惠施。惠施擔心莊周搶奪他的相位。莊周講了一個寓言，自比鵩雞（鳳鳥一類），認爲梁國的相位猶如一隻腐臭的死鼠，鵩雞是不屑一顧的。莊周不但鄙視卿相，連天子之尊都不放在眼裏。《逍遙游》載，堯讓天下於許由，許由不受，他對自己清貧而自由的隱居生活很滿足，不客氣地回答堯說：“歸休乎君，予無所用天下爲！”《讓王》篇載，舜讓天下於善卷，善卷回答說，自己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逍遙於天地之間，而心意自得，吾何以天下爲哉！悲夫，子之不知余也”。拒絕了舜的邀請。在這些故事中，莊周在鄙夷爵祿富貴的同時，還表現了對身居高位的統治者的揶揄。莊周對那些依靠權術手段竊取高位者更是非常輕蔑，在《胠篋》篇中，他把“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”的田成子稱爲盜賊，並揭穿了統治階級法律的虛偽性，“竊鈞者誅，竊國者爲諸侯”。

李白雖然渴望建功立業，但他主張功成身退，他不但不貪戀爵祿富貴，而且時常對它表現出輕蔑的態度。他也像莊周那樣，企求過逍遙自在的生活，而不願受爵祿富貴的羈絆：

綠蘿笑簪紱，丹壑賤岩廊。（《聞丹丘子營石門幽居》）

鐘鼓饌玉不足貴，但願長醉不用醒。（《將進酒》）

乍向草中耿介死，不求黃金籠下生。（《設辟邪伎鼓吹雉子班曲辭》）

他指出功名富貴只是瞬息榮華，短暫而不可靠：

功名富貴若長在，漢水亦應西北流。（《江上吟》）

他對權貴們抱着兀傲不馴的態度，自稱“不屈己，不干人”，“平交王侯”，他決不能爲了功名富貴而向權貴卑躬屈膝：

松柏本孤直，難爲桃李顏。（《古風》其一二）

黃金白壁買歌笑，一醉累月輕王侯。（《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》）

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，使我不得開心顏！（《夢游天姥吟留別》）

李白醉酒時要玄宗權臣高力士脫靴的故事，是爲大家所熟知的。杜甫《飲中八仙歌》描寫李白云：“天子呼來不上船，自稱臣是酒中仙”，表現了他對帝皇的兀傲。對爵祿富貴的鄙夷不屑，對權豪勢要的兀傲不馴，從思想淵源說，除莊周外，李白還接受了其他一些歷史人物的影響，如魯仲連、嚴光、嵇康、阮籍、陶淵明等等。但時間最早、思想言論表現得最深刻的還數莊周；而且嵇康、阮籍、陶淵明等人的這類思想和行爲，也是蒙受了莊周的影響。

李白在《古風》其二四“大車揚飛塵”篇中，揭露了玄宗時那些鬬雞徒的聲勢煊赫的醜態，最後說：“世無洗耳翁，誰知堯與跖！”直斥統治者爲盜跖，其氣概更是逼近《莊子·胠篋》篇。

莊周在《逍遙游》中，描寫了雄偉的大鵬鳥形象：“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，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……鵬之徙於南冥也，水擊三千里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。”還寫到大鵬鳥的行動，不能爲渺小的蟲、鳥所理解而受到嘲笑。這同《秋水》篇所寫河伯與北海若的對話一樣，都表現了莊周豪邁的胸懷和開闊的眼界。李白非常喜愛大鵬鳥的雄偉形象，他寫的《大鵬賦》、《上李邕》、《臨路歌》等作品中，都以大鵬鳥自比，抒寫其壯闊胸懷和宏偉抱負。在《大鵬賦》，李白更是淋漓盡致地描繪了大鵬“曠蕩而縱適”的非凡行動，同時對黃鵠、玄鳳等鳥類“拘攣而守常”的現象表示不滿，認爲它們不及大鵬的逍遙。我們讀李白藐視爵祿權貴的詩句時，常常感到其字裏行間洋溢着一種豪邁得無與倫比的氣概，詩人彷彿站在高山之巔，帶着輕蔑的目光，睥睨着世間的權貴及其藉以驕人的爵祿富貴。這種氣概，蘇軾曾借用西晉夏侯湛的話，譽之爲“雄節邁倫，高氣蓋世”（《李太白碑陰記》）。應當指出，李白正是在這

方面從《莊子》一書中吸取了精神力量，他正是在以大鵬鳥自比，把那些權貴和庸俗之徒視爲渺小的學鳩、斥鴳的思想狀態中，才產生了這種傲岸不凡的氣概。

李白在《大鵬賦》中贊美莊周及其《逍遙游》篇云：“南華老仙，發天機于漆園。吐崢嶸之高論，開浩蕩之奇言。”又在《贈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》詩中云：“過此無一事，靜談《秋水篇》。”都說明李白對莊周及作品，表現了高度的欽佩與愛好。李白詩歌，繼續並發展了莊周鄙夷爵祿富貴、藐視權豪勢要的傳統，表現了對統治階層的兀傲不馴態度和鮮明的反抗精神，構成了他詩歌進步內容的一個重要方面，值得我們珍視。

李白把屈原的積極入世精神和莊周的消極避世態度，用“功成身退”的口號統一起來，即一方面要建功立業，有所成就；同時又要不貪爵祿，見機隱退。在這對矛盾中，功成是前提，是矛盾的主要方面；即首先要建功立業，然後才能甘心隱退。他宣稱：“苟無濟代心，獨善亦何益！”（《贈韋秘書子春》）“銘鼎倘云遂，扁舟方渺然。”

（《金門答蘇秀才》）都鮮明地表現了這種主張。因此，屈原式的關心國家命運，積極要求參加政治活動，是他一生思想的主流。他前後兩次捨棄隱逸生涯，入長安供奉翰林和參加永王李璘幕府，也以行動實踐了首先要建功立業的主張。李白之所以成爲偉大詩人，這種積極入世精神是主要的思想基礎。過去有的評論者把李白說成是一位不食人間煙火的“詩仙”，這是片面的、不正確的。

爲了達到建功立業的目的，李白不但應徵入長安，而且廣泛游歷，結交一些達官貴人和地方長吏，希圖獲得他們的賞識和薦引。在這過程中，他還寫了若干投贈他們的作品，其中還不免說了些奉承對方的話。這種情況，在唐代知識分子追求仕宦的過程中，本是很平常的現象。這種情況，說明李白爲了要建功立業，並沒有也不可能完全做到他自己所宣稱的“不屈己，不干人”。但大體說來，李白的確對達官貴人經常保持着傲岸的態度。他並沒有爲了要做官而向權貴們卑躬屈膝，搖尾乞憐。他的《與韓荊州書》，在毛遂自薦時，仍然表現出昂首闊步的姿態。在政治上遭受嚴重挫折以後，他也不是純粹沮喪哀傷，而是唱出了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”的高昂歌聲。這種昂揚姿態和開朗胸懷，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道家特別是莊周的思想影響。李白從小愛讀道家書，信仰道教，因此，除掉進入仕途、建功立業的理想外，他找到了另外一個安身立命之所，那便是隱遁山林，求仙學道。他的最高理想是功成後再身退，但如果功業不成，或者根本沒有建功立業的機會，他也不會像屈原那樣感到別無出路，哀痛欲絕，而是有着他可以逍遙自在的廣闊天地。這裏雖然包含着不少虛無出世、宗教迷信等思想糟粕，但也支持了他藐視爵祿權貴的反抗精神。

我國古代文人，受儒家積極入世思想影響深的往往表現爲關心國事民生，要求

在政治上有所作為，但對統治階層人士大抵比較恭順，缺少反抗精神；受道家消極出世思想影響深的往往表現為蔑棄功名富貴，要求隱身遠害，但對國事民生大抵漠不關心，只是追求個人的逍遙自在。李白在很大程度上兼取兩家之長，而去其短，他既像屈原那樣熱愛祖國，積極要求有所建樹；又像莊周那樣鄙夷富貴，藐視權豪，把兩種大相徑庭的生活理想和政治態度溶合在一起，因而使他詩歌的思想內容和政治傾向，表現得既熱情，又潑辣，既執着，又超脫，在詩壇上開闢出一個獨樹一幟，前無古人的新境界，贏得許多人的矚目和驚嘆。

以上闡發龔自珍的一句話，論述李白詩歌與屈原、莊周作品的繼承發展關係，主要是從思想內容方面說的。至於李白詩歌的浪漫主義藝術特色，與屈原、莊周作品也有密切的繼承發展關係，但不屬於本文論述範圍，這裏就不去討論了。

略論莊屈對李白歌行詩的影響

陶 道 恕

歷來研究者都公認七古和七絕最能代表李白詩歌創作的最高成就。北宋蘇軾早就指出李白詩“飄逸絕塵”（《書學太白詩》）的特點。南宋嚴羽在以他與杜甫詩歌作比較時，又強調了“飄逸”的特點，並舉他的歌行名篇《夢游天姥吟留別》、《遠別離》等作代表。明初高棅重申嚴羽之說，再次突出了“李翰林之飄逸”是“盛唐之盛”的觀點。

李白七言古詩一開始就走着歌行詩的路子，它的直接淵源雖是漢魏六朝樂府詩，却也受了初唐詩人的影響。但李白“飄逸”詩風的形成，却有更早、更重要的淵源。

一般研究李白的學者，比較注意他尊重《詩經》傳統，反對雕飾造作，指出李白詩反映了唐代前期進步詩人對六朝“綺麗”餘波泛濫初唐詩壇之不滿和對開創盛唐嶄新詩風的要求。這無疑是正確的。對此，李白曾一再作過深刻概括。如《古風》其一推崇《詩經》的“王風”和“大雅”，慨嘆優良傳統衰歇，力圖加以恢復；《古風》其五一再提到“大雅”和“頌”，向往孔丘刪詩業績，都是人們所熟知的。但李白對傳統的繼承，並不限於儒家經典《詩經》。李白是唐代詩壇的一位浪漫主義大師，大家公認他的歌行詩特別富於浪漫色彩。可以毫不誇張地說，李白獲得浪漫主義大師稱號，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他在歌行詩創作上的獨特成就。導致這種成就的藝術淵源，當然不一定是《詩經》，影響較多的，應該說是南楚文學中的莊周和屈原。

關於李白所受屈原的影響，人們常常提到《古風》其一的“哀怨起騷人”。他對屈原的“哀怨”給予極大注意，正是《九章·惜誦》“發憤以抒情”，“願陳志而無路”的最好概括。《擬恨賦》深慨“永埋骨於淶水，怨懷王之不收”，《古風》其五一以殷紂殺比干與楚懷竄屈平相比，實際是以殷紂比玄宗，以屈原自況。他不但吟成“荊門倒屈宋”（《贈王判官，時余歸隱居廬山屏風疊》）的詩句，還發出“屈宋長逝，無堪與言”（《夏日諸從弟登海州龍興閣序》）的感傷。在歌行詩中，他多次把屈原的情志融入詩

篇。《江上吟》“屈平詞賦懸日月”，來自《九章·涉江》“與日月兮齊光”。《梁甫吟》“閭闔九門不可通，以額叩關闔者怒”，本之《離騷》“吾令帝閭開關兮，倚閭闔而望予。”《玉壺吟》“君王雖愛蛾眉好，無奈宮中妒殺人”，源于《離騷》“衆女嫉余之蛾眉兮，謠諑謂余以善淫”。《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沈之秦》“屈平憔悴滯江潭”，更有取於《漁父》“行吟澤畔，顏色憔悴”的描畫。《行路難》其三歷數“功成不退皆隕身”的“自古賢達人”，特舉“屈原終投湘水濱”爲例，則用了《九章·懷沙》“懷質抱情”，自沉“湘流”辭意。至於《鳴皋歌》明仿《卜居》之意，“作騷”便覺屈原“去人不遠”。（《唐宋詩醇》）

早在唐代，李陽冰爲李白《草堂集》作序，就注意到李白“驅馳屈宋”的特點。宋代朱熹更指出李白《鳴皋歌》“近楚辭”（《楚辭後語》），已注意到李白歌行詩學騷的問題。清初屈大均從李白歌行詩的整體論到屈原的影響：“樂府篇篇是《楚辭》”（《采石題太白祠》）。清康熙間應泗源在《李詩緯》中，特指出太白“於樂府多清怨”，劉師培《南北文學不同論》，也強調李白“樂府則出於《楚辭》”。他們都能着眼於屈原給予李白的影響。

關於李白所受莊周的影響，近來已有同志注意，但涉及面還不够廣。李白《古風》其三五就對莊周的藝術經驗發表過重要見解：“醜女來效顰，還家驚四鄰。壽陵失故步，笑殺邯鄲人。”李白針對初唐詩壇受六朝餘波影響而出現的追求形式、忽視內容的不良傾向，通過《莊子》中《天運》、《秋水》東施效顰、壽陵學步的故事，諷刺了這種傾向，否定了步趨前人，喪失自我，沒有獨立風格的創作風尚。“一曲斐然子，雕蟲喪天真”。對堆垛辭藻，講究“雕蟲篆刻”，“喪”失“天真”自然的詩風深表不滿。還通過《徐無鬼》中匠石的故事，表達了雖有革新詩壇風尚抱負，但知音恨少的感慨：“安得郢中質，一揮成風斤”。李白所引故事雖帶諷諭性質，却表明他對莊周文貴獨創的思想，深有體會。莊周是一位以散文著稱的哲學家，並不寫詩。李白能從廣義的文學著眼，引用上述三個故事來說明詩與散文的內在聯繫。他深知詩與散文都應反對刻板仿效，提倡匠心獨運，形成個人獨特風格。這大約就是李白從《莊子》那裏學到的最有益的創作經驗，因而才在《古風》其三五中作了重要概括。這是我們了解李白歌行詩的“飄逸”特點時，決不應該忽視的。

宋代蘇軾曾借晉代夏侯湛《東方朔畫贊》：“戲萬乘若僚友，視儔列如草芥，雄節邁倫，高氣蓋世，可謂拔乎其萃，游方之外者也”（《李太白碑陰記》）等語，讚美李白，這是他對李白詩歌接受了莊周影響的生動形象的概括，但蘇軾並未加以指明。明代胡應麟則明確提出：“千古詞場稱逸者，吾於文得一人，曰莊周，於詩得一人，曰李白，知二子之爲逸，則逸與神信難優劣論矣。”（《詩藪》外編卷四）楊慎也說：“莊周，

李白，神於文者也，非工於文者所及也。文雖至工，則不可謂神。然神非工之所至也。”（《楊升庵外集》）清代方東樹曾對李白的“飄逸”作了形象的解釋：“太白當希其發想超曠，落筆天縱，章法承接，變化無端，不可以尋常胸臆摸測，如列子御風而行，如龍跳天門，虎卧風閣，……瑤臺絳闕，有非尋常地上凡民所能夢想及者。”還指出李白直接受到莊周的影響：“大約太白詩與莊子文同妙，意接詞不接，發想無端，如天上白雲，捲舒滅現，無有定形。”（《昭昧齋言》卷一二）但關於莊周影響在李詩中的體現，方東樹却未加論證。

《大鵬賦》是李白深受《莊子·逍遙游》影響而寫，對莊周“吐崢嶸之高論，開浩蕩之奇言”的思想與藝術境界，作了很高評價。李白大為欣賞鯤鵬的形象：“激三千以崛起，向九萬而迅征”，認為鯤鵬“海運”“圖南”，“其動也神應，其行也道俱”，正體現了莊周順應自然的思想，也與他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（《知北游》）的觀點一致。李白強調自然天成，反對人工造作的審美觀，無疑也受到《莊子·齊物論》“天籟”“人籟”，《秋水》“無以人滅天”和《則陽》“力不足則偽”的觀點的影響。李白在七言歌行《上李邕》中，特用了《莊子》鯤鵬故事，“大鵬一日同風起，扶搖直上九萬里，假令風歇時下來，猶能簸却滄浪水。”借鯤鵬喻李，也是自我人格寫照。李白《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》，讀同《莊子·逍遙游》《齊物論》“尺鷃不羨於鵬鳥，秋毫可並於太山”，“何小大之殊也”的觀點，也體現了他曠達為懷的人生觀。在《臨路（終）歌》中，他為不能實踐“飛振八裔”的政治抱負深感遺憾，而自比“中天摧兮力不濟”的“大鵬”。他還在《答長安崔少府叔封游終南翠微寺太宗皇帝金沙泉見寄》中，對《莊子·秋水》“河伯見海若，傲然誇秋水”的故事，發表了“小物昧遠圖，寧知通方士”的評論。在歌行詩《妾薄命》中，更把《秋水》對“唾”的生動形容“噴則大者如珠，小者如霧，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。”融入詩行，生發出新意：“咳唾落九天，隨風生珠玉。”用咳唾隨風，象徵能使人貴賤的權力，寓意十分深刻。《莊子·天運》東施效顰故事，李白也一再用入歌行詩：“西施宜笑復宜顰，醜女效之徒累身”。（《玉壺吟》）這不像《古風》其三五作為藝術經驗來概括，而是比喻人事，意在諷諷邪妒忠良。《莊子·外物》任公子東海釣大魚的故事，他在歌行名篇《猛虎行》中也有表現：“我從此去釣東海，得魚相見情相親。”故事中大魚牽鈎“奮鬚”時，“白波若山，海水震蕩”的神奇想像，與李白未能實現政治追求很容易引起共鳴，所以如此激賞。《莊子·天地》“大聲不入於里耳，《折楊》《黃華》則嗑然而笑”的比喻，經李白用入歌行詩《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》，就成為諷刺當時流俗好尚的名句：“《折楊》《黃華》合流俗。”《莊子·大宗師》“淒然似秋，暖然似春”二句，郭象注解說：“暖然若陽春之自和，故蒙澤者不謝；淒乎

若秋霜之自降，故凋落者不怨。”李白歌行詩《日出入行》，即本此寫成“草不謝榮於春風，木不怨落於秋天。誰揮鞭策驅四海，萬物興歇皆自然”等名句。這也是莊周順應自然思想在李白歌行詩中的藝術表現。

李白向莊、屈汲取詩意與詩境，上面分別舉了一些較為明顯的例子，當然並不等於李白所受莊、屈影響的全部情況。更為重要的，應該對李白向莊、屈學習藝術經驗問題作深一層的探求。

過去的李白研究者一般都只注意到李白所受莊、屈的各別影響，只有清代的龔自珍和劉熙載能從李白對莊、屈的結合上進行藝術考慮，從而進入到一個較高層次的探索，這就超出了“太白詩宗風騷”（胡震亨《李詩通》）的傳統提法，擴大了研究視野，而具有新的意義。

龔自珍認為：“莊、屈實二，不可以並，並之以為心，自白始。儒仙俠實三，不可以合，合之以為氣，亦自白始也。”（《定庵文集補編·最錄李白集》）龔說李白“並”莊屈“以為心”，“合”儒仙俠“以為氣”，是李詩之“真源”所在，這是很富創解的提法。與龔同時的劉熙載，則發表了如下見解：“太白詩以莊騷為大源，而於嗣宗之淵放，景純之儔上，明遠之驅邁，玄暉之奇秀，亦各有所取，無遺美焉。”（《藝概·詩概》）劉熙載“太白詩以莊騷為大源”，與龔自珍李白之“真源”是“並莊屈以為心”的提法，如出一轍。

李白歌行詩既代表了李白詩歌的最高成就，無疑也是李白詩的“飄逸”風格的典型體現。李白詩的這種“飄逸”風格，是有其個性特點的。問題在於：體現在他的歌行詩中的，既有來自中原文學中的儒家經典著作《詩經》的影響，也有來自南楚文學中的莊、屈的影響，而後者更占了較大的比重。甚至可以說，在他的歌行詩中，有鮮明體現、起重要作用的，乃是南楚文字的影響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莊周順應自然，不隨流俗的思想，和屈原殷憂國事、哀怨無端的感情，在同一個詩人的作品中，是較難取得和諧完美的統一的。在龔、劉未發表上引評論前，很少有人從這方面去加以考慮。我們如果結合李白歌行詩對這一問題作進一步考查，就會得出與他們一致的結論。

李白歌行詩的主要風格特點是飄逸，說它來自莊周的順應自然、不隨流俗的思想，這是容易理解的。問題在於：它如何與屈原的“哀怨”之情統一起來。對這問題，首先需要從李白的的生活與教養去考查。李白曾接受過儒家思想教育，對管、樂和謝安一類的政治人物很傾慕，因而很有濟世拯時的政治抱負，但他對道家思想和游俠學仙之事，又表現出極大的興趣，這便決定了他思想的複雜性。李白一生中，有時儒家思想在他身上占主導地位，有時道家思想在他身上起了重要作用。正是上述複雜因

素決定了李白歌行詩的獨特性和創造性。作為一個莊周思想的崇拜者，他發現在歌行詩中能够最有效地體現莊周“如列子御風而行”，“如天上白雲，捲舒滅現，無有定形”（方東樹語）的思想境界，這與他的浪漫氣質很合調。但作為一個詩人，他既稱讀屈原執着追求美好政治理想，又惋惜他懷沙自沉。因而在歌行詩中汲取屈原詩意時，更多地表現出為他所特有的“哀怨”之情。並在這種“哀怨”之情中，滲入莊周順應自然，曠達為懷的思想因素。這就是從李白歌行詩中往往能摸觸到寓托於“哀怨”之情中的順乎自然的曠達思想成分的原因。但屈原思想在他身上却常居主導方面，這又是他死前一年聞太尉李光弼“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東南”，討平安史叛軍時，還北上“請纓，冀申一割之用”的思想根源。宋、明學者為什麼把“飄逸”作為李白詩的主要風格，原因就在此。“興酣落筆搖五湖，詩成笑傲凌滄洲。”（《江上吟》）應該說，這一特點，在李白歌行詩中是表現得最為突出的。

李白歌行詩題材內容，涉及面相當廣泛。有對國事的憂慮和人民生活的關心，有政治抱負和在長安挫辱的抒寫，有對婦女的同情，有對親情和友誼的描述，有懷古、詠物、寫景的篇什等，它們都程度不等地體現了“飄逸”的特點。李白歌行詩中的這種風格，便是莊、屈的創作精神有機結合的產物。他既有建功立業，使“寰區大定，海縣清一”（《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》）的宏願，又有兀傲不隨流俗，鄙夷富貴，想做隱士神仙的思想。出世與入世，即莊周式的放達與屈原式的哀怨，在他身上形成矛盾與統一。既不是與現實絕緣、飄飄欲仙的道教徒，又因在政治追求上失意，往往表現哀傷與怨憤，這可說是李白歌行詩的“飄逸”風格的基本特點。龔自珍和劉熙載就是從兩者的結合上去把握李白詩歌的“真源”與“大源”的。

不過李白大多數歌行詩體現莊、屈思想的結合，並不限於詞句的化用，更在於精神的融入。而且這種融入，常呈現複雜多樣的特點。如關心國事，憂慮時局的《遠別離》：“君失臣兮龍為魚，權歸臣兮虎變鼠”，是他對玄宗後期奸臣擅權，將為禍亂之階的警告，也是《離騷》“泥又貪夫厥家”，“殷宗用而不長”，和《莊子·胠篋》“大盜”“竊國”思想的綜合體現。李白譴責玄宗晚年進行曠武戰爭之作，如《戰城南》的“征戰無已時”，“野戰格鬪死”，“士卒塗草莽，將軍空爾為”，便滲透着屈原《九歌·國殤》“左驂殪兮右刃傷”，“嚴殺盡兮棄原野”的感情。而“乃知兵者是凶器，聖人不得已而用之”，固有《老子》“兵者不祥之器”的思想因素，但也雜入《莊子·天地》“愛人利物之謂仁”，《徐無鬼》“無以戰勝人”，《則陽》“爭地而戰，伏尸數萬”的思想成分。在《登高丘而望遠海》中更以秦皇、漢武“窮兵曠武”比唐玄宗，難怪王夫之《唐詩評選》會有“後人稱杜陵為詩史，乃不知此九十一字中有一部開元天寶本紀在”的讚譽。深切關注安史叛亂中受苦受難的

廣大人民的《猛虎行》：“秦人半作燕地囚，胡馬翻銜洛陽草。”《扶風豪士歌》：“洛陽三月飛胡沙，洛陽城中人怨嗟。天津橋水波赤血，白骨相撐如亂麻。”都能與屈原《離騷》“哀民生之多艱”，《九章·哀郢》“民離散而相失兮”，“遵江夏以流亡”的辭意引起聯想。

李白歌行詩曾多次反映和回憶他在長安待詔獻納時的情況。“一朝君王垂拂拭，剖心輸丹雪胸臆。忽蒙白日生景光，直上青雲生羽翼。”（《駕去溫泉宮後贈楊山人》）“揄揚九重萬乘主，謔浪赤墀青瑣賢。”（《玉壺吟》）自我吹噓，不免表現出思想中庸俗一面。但即使這類作品，也流露他對遭讒受謗的不滿情緒：“浮雲蔽日去不返，總爲秋風摧紫蘭。”（《答杜秀才五松山宣城見贈》）“前門長揖後門關，今日結交明日改。”（《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二首》）李白不滿黑暗現實和爲權奸擯斥的憤懣，在歌行詩中更有表現。如《行路難》其二的“大道如青天，我行不得出。羞逐長安社中兒，黃鸝白雉賭梨栗”。《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》的“君不能狸膏金距學鬪鷄，坐令鼻息生虹霓”。他對朝中夤緣倖進腐敗現象，表示憤怒，特別對賢愚不辨，忠奸不分的黑暗現實不滿：“漢朝公卿忌賈生”，（《行路難》二）“楚地由來賤奇璞”，“襦衡耻逐屠沽兒”，“董龍更是何雞狗”。這樣，自然會落得讒謗辭朝下場：“一讒一笑失顏色，蒼蠅貝錦喧謗聲。”（《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》），這些都與屈原《離騷》“世混濁而不分兮，好蔽賢而嫉妒”，“蘭芷變而不芳兮，荃蕙化而爲茅”的思想感情很合拍。而《鳴皋歌送崔微君》的“鷄聚族以爭食，鳳孤飛而無鄰。蜺蜺嘲龍，魚目混珍，嫫母衣錦，西施負薪”，更是對黑暗現實的強烈抗議。

但李白想對李唐王朝有所獻納，却是出於至誠：“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”（《遠別離》），“白日不照吾精誠”（《梁甫吟》），這裏有《離騷》“荃不察余之中情”的回聲，也是《莊子·天地》“忠臣不諂其君”，《外物》“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”和《漁父》“真者，精誠之至也，不精不誠，不能動人”的名言的同調。《長相思》借美人托喻，“妙於言情”，更近似屈原的創作特點。胡震亨說“開頭即曰‘在長安’，其意已見”。王夫之說“題中偏不欲顯”（指“長相思，在長安”之“如花美人”），“象外偏令有餘”（指“卷帷望月”，“雲端”遠“隔”，“天長路遠”，“夢魂不到”），纏綿宛轉之情，已超過一般男女相思，更近似“靈修美人以嬋於君”（王逸《離騷經·序》）的君臣關係寄托；也不能說沒有《莊子·人間世》“臣之事君，義也”，“無所逃於天地之間”的思想淵源。它同《行路難》其一的“忽復乘舟夢日邊”，《登金陵鳳凰臺》的“長安不見使人愁”，顯然是有內在聯繫的。不能因爲《唐宋詩醇》有賢臣“不遇”，“不敢忘君”的“忠厚之言”的評語，便斷定它是“寄贈遠人，自道相思之詞，未必別有寓意”。（詹鍔《李白樂府集說》）